

全球化 对我国政治价值 的挑战与对策研究

丁志刚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全球化 对我国政治价值 的挑战与对策研究

丁志刚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化对我国政治价值的挑战与对策研究/丁志刚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6
ISBN 7-5004-5653-0

I. 全… II. 丁… III. 经济一体化 - 影响 - 政治 -
研究 - 中国 IV. D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9635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责任编辑 樊 夫
责任校对 安 然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三河鑫鑫装订厂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1/32 插 页 2
印 张 9.625
字 数 249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二章 全球化与人类政治价值取向	(16)
第一节 政治价值的含义及其基本特征	(16)
第二节 政治价值的功能	(24)
第三节 全球化的概念、动力及其内在矛盾	(31)
第四节 全球化背景下人类政治价值的基本取向	(47)
第三章 全球化与我国政治价值取向	(71)
第一节 历史视野中的我国政治价值走向	(71)
第二节 我国现有政治价值体系改革走向回顾	(73)
第三节 全球化与我国政治价值取向	(80)
第四章 全球化对我国政治制度的挑战和影响	(100)
第一节 全球化对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挑战和 影响	(101)
第二节 全球化对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挑战和 影响	(109)
第三节 全球化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挑战和 影响	(129)
第五章 我国的应对策略（一）	(134)
第一节 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134)

第二节	不断改进和加强执政党的建设	(141)
第三节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国家行政制度创新	(173)
第四节	坚持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178)
第五节	不断推进国家制度创新	(189)
第六节	加强政治文明建设，推进我国政治发展	(196)
第六章	全球化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挑战和影响	(209)
第一节	挑战和影响的主要力量	(209)
第二节	挑战和影响的主要领域	(220)
第三节	挑战和影响的主要途径和方式	(240)
第七章	我国的应对策略（二）	(255)
第一节	与时俱进，大胆地进行意识形态创新	(255)
第二节	加强意识形态领域阵地建设，用先进文化占领社会主义思想阵地	(269)
第三节	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273)
第四节	利用网络资源传播先进意识形态	(294)
主要参考文献	(300)	
后记	(303)	

第一章 导 论

一

20世纪末，国内外学术界掀起了一股以经济全球化为重点的全球化研究热潮，至今热度不减。其实，全球化作为一个极富扩张性和想像力的命题，正是其事实上的重大影响力，才引起各国学者的热烈讨论。今天，在全球化条件下，我们讨论任何重大社会问题，既要考虑到不同国家的国情、史情和文化传统，更要考虑到全球化趋势的制导作用。

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也正值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年代，二者的紧密契合，很快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密切关注。我国学者积极加入到关于全球化问题的学术研究潮流中来，一方面研究全球化的基本理论问题，探讨全球化的基本概念、发展阶段、内在动力、深远意义等基本问题；另一方面更加关切全球化对我国的意义和影响，关注全球化对我国现代化和社会转型、对我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冲击与挑战，并寻求我国应对全球化的出路与对策。

我国大多数学者相信，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对我国而言，是具有革命意义的一场大变革。随着我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广度和深度的不断加速进行，我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和社会大转型又增加了新的内涵，即我国社会不仅要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而且将在步入现代社会的同时，融入人类全球化进程之中。全球化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影响我国社会进步的重大力量，

不论这种力量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因为在有些情况下、在某些领域内，我国可以对全球化产生积极影响，我国是全球化的主动参与者和受益者；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在另外一些领域内，我国只是全球化进程中的被动参与者甚至受害者。同时，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我国学者大多相信，我国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之中必将对全球化产生一定影响，而且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长，这种影响将进一步增加，我国必将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但是，从目前的讨论来看，大多数全球化论者更多地认识到全球化对于各国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深刻影响，注意到了全球化作为一个不可避免的客观趋势，是任何国家、任何地区无法回避的，各国、各地区只能采取积极姿态认真应对全球化。相对而言，全球化对政治方面的影响，人们似乎不愿讨论。其实，全球化对各国政治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理论界不应当有意或无意地回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目前的全球化虽然主要在经济领域展开，但其所蕴存着导致组织、结构和制度深刻变化的强大力量，足以表明其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是巨大的。对于政治来说，空间的变化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结构、秩序和交往方式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国家的存在方式与治理方式。因为，以主权、领土与人民为基本要素的现代国家，本身就是一个空间体。显然，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空间结构，将直接挑战基于工业化时代发展所形成的现代国家这个空间体。所以，有人认为：全球化有力地揭示了国家政治的限度。^①

事实上，与全球化对各国经济、文化等领域产生着广泛影响一样，它对各国政治领域特别是政治制度、政治体制与政治价值

^① 参见林尚立《全球化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载《党政论坛》2002年9月号。

观、政治意识形态也将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虽然没有任何迹象或事实表明，全球化将使现有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体系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全球化所提出的挑战，要求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思考一个基本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应如何存在和发展。这其中不仅涉及国家的发展战略，而且涉及国家的治理方略与制度架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必将在世界各国，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引发新一轮的国家建设，以构建各国在全球化时代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价值体系、制度体系和组织体系。^①

本书正是基于全球化对各国政治体系产生着深刻影响这一基本判断而展开研究的。我们认为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将对各国政治生活构成挑战与影响，只不过这种挑战与影响对各国而言在幅度、深度和时序上会有所不同。“全球化及其文明的转型是一个客观事实与趋势，它导致了新的政治现象与政治关系，并影响和制约着全部政治生活。因此，21世纪政治学的建设与发展，必须自觉关注全球化背景与主题，否则就脱离了时代。”“正在显现的全球政治、公民社会、人类共同利益、治理等人类政治实践，同样对中国政治产生着影响。我们不能把中国的政治实践与人类的政治实践割裂开来，后者在更广阔的背景下制约、修正着中国政治实践。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错位并存的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现代化历程和国家政治实践不可能保持原有的样式，而必然会受到新政治现象的冲击。”^②

在本书中，我们分析全球化对我国政治领域构成的挑战与影响，选取了政治价值作为逻辑主线，试图在对政治价值问题进行

^① 参见林尚立《全球化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载《党政论坛》2002年9月号。

^② 蔡拓：《全球化与二十一世纪的政治学》，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一般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政治价值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在第二章中讨论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价值问题。第三章从总体上探讨了全球化与我国政治价值取向。我们将政治价值理解为表示政治主客体关系的一个范畴，它指的是政治客体对政治主体需要的满足程度，即包括政治个体和政治组织在内的“政治人”即政治主体对政治生活的需求。换言之，政治价值就是政治客体对政治主体所具有的意义，它通过政治主体对政治客体的认同或排拒、支持或反对、构建或废除的政治实践活动体现出来，凝聚在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两个大层面上，前者属于政治生活中物质的、实体的方面，它规定着政治主体的地位和政治客体的性质，后者属于政治生活中精神、观念的方面，它以理性思维和价值导向的方式把握和论证政治主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因此，要观察特定政治主体的政治价值，主要是通过考察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政治理论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逻辑表达方式和理论范式来进行。为此，我们集中讨论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政治制度与政治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二

就政治领域而言，全球化必然要对各国原有的政治体系构成挑战。

首先，全球化挑战国家主权原则。当代国家均为主权国家，主权是国家最根本的属性。在早期的经典理论中，主权被认为是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可分享的，具有绝对性。在实践上，绝对主权论成为近代欧洲民族国家产生的思想基础，尔后也一度成为亚非拉国家和地区反抗西方殖民主义统治、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理论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国家的独立，主权原则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之一，包括联

合国在内的许多国际组织都认可、坚持主权平等原则。但是，随着国家间相互依赖关系的不断加强，特别是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客观上对国家主权提出了挑战，主权的让渡已经成为司空见惯和不可避免的现象，主权已由往昔的绝对性向相对性转变。“全球化的意义尤其在于，它是对传统的国际关系、对国家主权及其他权利，对以国界标示人群活动区别的规则的一种深入持久的挑战。”^①因此，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行使主权时，一方面，必须考虑全球性规则、相关国际组织及他国的利益，一意孤行只能招致国际社会的反对，甚至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另一方面，在全球依存程度加深的情况下，绝对主权原则有时会与国家最高利益发生冲突。事实上，当代国家从政策制定、法规设立等宏观管理到军事、科技、金融、财政、贸易、环保、人口等微观管理，无不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和制约，主权让渡、行使相对主权已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客观要求。“因实行全球化而建立起来的世界性社会不仅在经济上，而且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阶层、通讯网络、市场关系和生活方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疆界。在体现主权的每一个支柱——征税、维持公共秩序、制定外交政策和维护军事安全中，这一点特别明显。”“单一民族国家在各个方面都要失去其主权和实质内容：金融资源、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决定发展方向的权力、信息和文化政策、普通公民的特性等。”^②

其次，全球化导致各国政治不稳定的发生几率增大。全球化既加深了各国的联系，也增加了不稳定的风脸性。因为随着相互依赖关系的加强，一国发生危机会出现连锁反应，很快波及邻国、整个地区乃至全球，引起大范围的“共振”。全球化时代国

① 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 页。

② [英] 乌尔里克·贝克：《全球化挑战传统秩序》，载《参考消息》2000 年 1 月 5 日增刊第 10 版。

际干预的力度空前加强，人权、民族主义乃至领土完整等最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存在着被国际共同体干预的现实可能性。^①因此，全球化对各国政府的能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一国政府与领导人能否具有全球视野和推进世界一体化的决心，能否把这种认识贯彻到国家的内外战略，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该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前途和命运。这一点对于仍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再次，全球化对各国政治制度与体制产生影响。就政治制度与体制而言，尽管各国史情、国情不同，不可能采取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与体制，但各国都以现代宪政体制、民主体制为理念，依法治国，推进政治现代化进程。其实，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制度与体制在民主、开放、自由、现代性方面是一致的，在立法、司法、行政方面是互相学习、互相合作的。同时，在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各国将根据通行国际规则的要求，修正、调整、完善国内体制使其与全球化的规则相适应，同全球化规则相衔接。如同现在的世界贸易组织一样，它有一套由成员国共同制定的通行规则，其参与国必须调整、修改自己国内的有关规则，使之与世贸组织的规则相适应，否则就被排除在外，处于危险的边缘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有些西方学者认为，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与体制是现代国家政治制度与体制的样板和其他国家未来的唯一选择。他们所说的政治制度与体制是以多党制、议会制、选举制和三权分立为核心。亨廷顿在其《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坚信：如果第三波有一个未来，这个未来就在于民主在非西方社会的扩展。福山甚至断言西方民主政体的全球推广意味着“历史的终结”。不可否认，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与体制确

^① 参见蔡拓《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有它的长处，但并非尽善尽美，西方式政治制度与体制在全球占据优势，但并不说明它是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的唯一选择。全球化对国家政治制度与体制的要求是现代的、民主的，而并非西方式的、单一的，应该坚信不同的民族国家在走向现代化、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会根据各自的情况选择既适合于本国国情又符合全球化要求的现代的民主的国家政治制度与体制。

总之，全球化绝不是人们的主观想象，更不是虚拟的空中楼阁，而是实实在在的客观现实存在。全球化对人类政治价值体系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挑战，在全球化时代，各国都将不可避免地重新审视自己的政治价值取向。

尽管如此，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对人类原有政治价值的彻底性颠覆。相反，人类在长期的政治探索实践活动中被反复证明作为人类政治公理的制度和理念如正义、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和谐、自治等，将进一步被发扬光大，进一步彰显其生命力，成为人类普适性的政治理念。同时，全球化将使各国政治生活尽可能向趋于民主化、法治化、文明化、现代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毫无疑问，全球化也必然对我国原有政治价值产生深刻影响。但是，我们坚信，我国作为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全球化作为一种外在的从某种意义上也不可抗拒的力量，将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改革和政治价值重建更具动力与活力、更具目标性与针对性。正是由于全球化的到来与我们的主动参与，给了我们进行政治价值体系重构的新参照系，给我们提供了与世界各国站在同一发展平台上的机会。关键是我们必须顺应全球化潮流，主动进行包括政治的变革与创新，重建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政治价值体系。关键是以全球化来思考我国政治价值取向，要求我们应当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在更广阔的思想空间里思考我国的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使我国政治价值取向尽可能符合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客观进程。其中，政治民主化是全球化时代我国政治价值的

根本目标，政治法治化是全球化时代我国政治价值的方略选择，政治现代化是全球化时代我国政治价值的实现形式，政治决策科学化是全球化时代我国政治价值的内在要求，政治和谐化是全球化时代我国政治价值的运行态势，政治文明化是全球化时代我国政治价值的发展形态。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应当全面考量全球化对我国政治制度的挑战与对策，积极主动地加入到全球政治制度文明的潮流中去，这既是全球政治制度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政治制度文明创新的必然之举。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彻底改变我国现有政治制度的基本内容和构架，更不能认为西方的政治制度就是适合全球化的理想模式。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会给人类政治制度文明带来新的鲜活力量，并昭示着人类政治制度文明发展的理想目标和必然趋势。我们坚信，全球化对我国政治制度的挑战同时也是其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动力和难得契机，我国政治制度文明的发展必将推动世界政治制度文明向科学的、光明的道路顺利前进。为此，在本书第四章和第五章中，我们重点讨论了全球化对我国根本政治制度与主要基本政治制度的挑战及对策。

三

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等人在《全球大变革》一书中指出：“全球化反映了一种广泛的认识：在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的推动下，世界正在被塑造成一个共同分享的社会空间；在全球一个地区的发展能够对另一个地方的个人或社群的生活机会产生深远影响。”^① 全球化对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我

^① [英] 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 页。

们除了把握全球化的现实性影响之外，更应注意它对于人们的心理、观念、价值系统、文化、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的影响，更应关注全球范围内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间价值观念和文化符号之间的激烈碰撞与交锋，关注全球化条件下民族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境况。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总体上作为全球化中的“弱势群体”，其民族文化包括政治意识形态必然要受到较大冲击。这一点近年来已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基于全球化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以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作为推行其全球战略的重要工具，许多国家的学者提出“文化殖民主义”、“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分析概念，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较多研究，并试图寻找全球化条件下保护本国民族意识形态和文化的途径与方法。

确实，全球化过程既是西方挟全球化之势推行其思想文化观念、推销西方生活方式的过程，也是各民族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解构和重构的过程，是各种文化形态和意识形态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而融合的过程，更是各种文化和意识形态间激烈对抗的过程。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必将把这一过程明晰地展示在我们面前。就我国而言，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进程和我国入世的现实，必然要引起人们思想意识、精神文化层面的相应变化，诸如个人、团体、民族、国家、地区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性质、结构、内容等，在一定程度上都要受到全球化发展的影响。如果我们只重视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物质层面和技术层面的挑战，而看不到全球化对文化、价值观等精神、思想、观念层面的深刻影响，看不到全球化对主流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冲击与挑战，即使我们在物质和技术领域达到了全球化的水平，甚至后来居上，但由于我们文化、精神和价值家园的失落，我们民族和国家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根基被剥离，我们终将是全球化中的失败者。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忧患意识，首先要认清全球

化背景下民族国家间的复杂关系，认清民族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实际境遇，从而确保民族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完整性、独立性、继承性和创新性。

其实，不同民族国家间文化和意识形态间的复杂关系早就存在着，而且这种关系不仅仅是相互接纳和相互平等地进行学习与交流，其间存在着大规模的流血战争和明显的不平等，即强势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弱势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挤压、侵略甚至灭绝。古代民族间意识形态的斗争往往以宗教的方式进行，而到了近代以后则是被完全世俗化了的与现实利益密切相关的“科学观念”。

欧洲中世纪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以纯洁宗教的名义，联合世俗封建统治者、意大利商人对东部沿岸各国发动的十字军远征，就是在宗教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教会成为事实上的统治者的背景下，基督教会发动的主要针对穆斯林的一场文化与意识形态战争。当时主张纯洁基督教的代表人物教皇格里高利七世认为，“正义就是实现基督徒的理想”，纯洁宗教的最终目的和最高使命是将基督教的理想和正义推广到世界范围内，让基督教统治整个人类。出于这种理想，格里高利七世于 1073 年拟定出教皇统治世界的纲领，这一纲领后来由他的继任者乌尔班二世通过动员十字军东侵而付之实施。这就是 1096—1291 年间罗马教廷动员的十字军对东地中海沿岸各国发动的共计达 10 次的侵略性远征。“这样的远征如若没有教会的掌控，没有对圣地的信仰，而径直地往圣地进发，那是不可想象的。”^①

公元 7 世纪伊斯兰教产生后崛起的阿拉伯帝国，也在宗教名义下发动了一系列征服战争。在伊斯兰世界，统治者统治广大被征服地区的合法性和理论基础均来自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是帝国

^① [德] 诺贝尔·埃利亚：《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第 45 页。

权力和政治统一的来源，是保持政治忠诚和普遍认同的意识形态，也是哈里发发动圣战的依据。不论早期的阿拉伯帝国，中期的哈里发帝国，还是晚后的奥斯曼帝国，尽管事实上都以军事立国，各自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结构也不尽相同，但统治者都把伊斯兰教视为政权的精神支柱，需要宗教赋予其合法性。宗教支持国家政权，其自身也得到政权的庇护和赞助。帝国发动的对外战争也往往赋予“圣战”的宗教外衣。

到了 20 世纪，意识形态的偏见使西方国家一直将革命的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视为洪水猛兽，特别是这种革命的意识形态从知识分子的书斋走入群众当中，继革命成功后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之后，西方自由派人士便生活于一种虚拟的“红色阴影”下，不相信能与“异教徒”有任何的合作机会。这种不信任和敌意导致张伯伦宁可相信希特勒也不相信斯大林的和平诚意，导致世界大战的恶梦降临人间。战争后期同盟国的几次重要会议上，三巨头又勾心斗角，最终导致了美苏之间的冷战全面爆发，东西方集团因意识形态的不同而导致全球陷入深刻的冷战氛围之中，西方集团以“共产主义的扩张”、“极权主义的威胁”为由攻击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则批判资本主义的腐朽与没落，进行“革命输出”。有些西方史学家将革命看作是 20 世纪意识形态冲突的根源，认为正是法国大革命浪潮所产生的若干“进攻性”的意识形态打破了资本主义体系内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平衡，使世界政治陷入了意识形态的对抗。其实，并不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导致了世界的分裂与对抗，而是西方在“退守”过程中所滋生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对外排斥导致了这种局面。

应该说，随着冷战的终结，美国和西方集团理应放弃过时的冷战思维，寻求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新途径。然而，遗憾的是美国并没有这样去做。它凭借自己超强的实力，继续奉行冷战思维，

用旧的意识形态的眼光认识世界，必欲将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从全球消灭而后快。因此，美国用一切办法将其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普世主义的观念推向全球，试图为其霸权获得“合法性”，即其他国家在观念和意识形态上的认同和支持。其实，人们对此都很清楚，美国普世主义的观念当中不可避免地渗透着自身国家的利己主义欲望。“9·11”恐怖事件对美国来讲本是一场莫大的悲剧，美国理应通过这一事件深刻反省。但美国却借“9·11”事件在全球范围内以“反恐”为名，大张旗鼓地推行文化霸权主义，意欲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强加给他国，这不能不说这是人类文化和文明的一场悲剧。

事实告诉我们，只要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国际体系存在，国际间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和斗争就始终存在。因此，正视这方面的矛盾和斗争，避免盲目的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是一个民族国家的理性态度和现实选择。摩根索总结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的作用时说道：“如果一个政府的外交政策对它的人民的知识信念和道德价值观念有吸引力，而其对手却没能成功地选定具有这种吸引力的目标，或者没能成功地使其选择的目标显得具有这种吸引力，那么，这个政府便会对其对手取得一种无法估量的优势。像所有思想观念一样，意识形态是一种武器，它可以提高国家的士气，并随之增强国家的实力，而且正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会瓦解对手的士气。”^① 所以说，意识形态在权力政治中既是一张入场券，又是一个能量放大器。西方国家对革命的意识形态进行攻击的原因并不在于这些意识形态本身是否带有所谓“进攻性”，而是由于这些意识形态聚合了广大群众的力量，并且将这种力量放大到数倍，从而导致了国家实力对

^①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6—127页。